

● 史学论坛

尊重与援助 新中国对朝鲜外交方针的形成 (1950-1955)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摘要: 为了加强中朝友谊,缓解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毛泽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和军队尊重朝鲜,平等待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则千方百计、倾其全力援助朝鲜。这种政策和做法,从中国出兵朝鲜一直延续到战后朝鲜的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新中国对朝鲜外交的基本方针。

关键词: 中国外交;中朝关系;对外援助

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后果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从苏联转向了中国。朝鲜战争期间,在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安排问题上,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矛盾,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最后的结果都是朝鲜依从了中国的主张。其结果,自然造成朝鲜领导人对中国的不满,并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然而,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和领导者,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新中国也没有像斯大林在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直接控制。为了加强中朝友谊,缓解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毛泽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和军队尊重朝鲜,平等待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则千方百计、倾其全力援助朝鲜。这种政策和做法,从中国出兵朝

鲜一直延续到战后朝鲜的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并构成新中国对朝鲜外交方针的主旋律。

一、毛泽东建构中朝友谊的努力

早在志愿军刚刚组建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对朝鲜的关系问题。在修改1950年10月18日下达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时,毛泽东特意增加了一段话:“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12月3日在北京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又当面告诉他:“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志

作者简介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主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27-37页;《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第4-16页。

关于苏联占领朝鲜时期的情况,详见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第22-3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36页。

愿军要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金首相,拥护朝鲜人民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军,要搞好双方关系。

对于彭德怀在电报中所说朝鲜党的一些政策缺陷及两军配合作战的意见,毛泽东在1950年11月12日的回电中特别叮嘱彭:“与朝鲜同志商谈应注意方式,应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与朝鲜争论和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要等打了很多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的,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这是很自然的。”注意到中朝关系有些紧张的苗头,毛泽东又在12月26日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特别指出: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全军主力后撤休整时,要“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以撤职处分),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军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审阅了彭德怀在中朝军队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的报告稿。“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毛泽东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并加写了一大段话:“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想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下去后,引起志愿军各部队高度重视,把团结朝鲜军民和遵守纪律看作是“重

大的政治原则问题”,纷纷进行检讨、制定措施,并严厉惩治违纪者。第十二军政治部在全军政工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与朝鲜同志的联系,对朝鲜工作人员不能乱批评。要尊重朝鲜人民的习惯,进门脱鞋,不随地吐痰。铁路军运总局高级干部会也提出,在铁路运输和抢修工作中,要加强中朝团结,密切军民关系。在生活和工作上要注意与朝鲜同志密切合作,严格检讨自己,严格约束自己,多帮助别人,多主动解决问题。很多部队还专门订立了中朝团结公约及各种规定,要求干部战士互相监督执行。

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和战后时期,中国领导人始终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如1953年2月7日,朝鲜授予金日成元帅称号,发现中国有些报刊未注意到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宣传部4月23日专门向全国各地宣传部门发出通知,今后对金日成的称呼,一律由“将军”改为“元帅”。1953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即将访朝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团团长贺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等人。谈话中,周特别提到,因为前两年战火纷飞,赴朝慰问团先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是可以的,朝鲜同志也能理解。现在朝鲜已经停战,当时战争环境所允许的那种办法也要随之改变。中朝友谊确实是鲜血凝成、亲如兄弟,但我们是两个国家,一定要按国家关系处理。因此,这次慰问团要先去平壤看望金日成,代表团一切活动也要听从朝鲜政府的安排。

战争期间,除了给予朝鲜政府和军队的直接援助,中国还有很多无形的开支用于朝鲜。如铁路运输一项开支,从1951年中朝联运司令部成立到1953年底,就达2亿元,其中直接援助朝鲜占95%。更重要的是,中国还为解除朝鲜民众的苦难付出了极大努力。三年来,中国政府为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和生活物资援助,总价值约7.3亿元(至1953年底)。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捐献运动也颇有收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48页,第420-422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284、285页。

翰林大学亚细亚文化研究所编:《韩战期间中共军队文件》第二卷,资料丛书第30期(中文影印件),翰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4、291-294页,志愿军各部队制定的中朝友好守则、规定见第271、315-317、362、363页,做出的违反军纪判决书见第255、265、266页,李寿轩在运输和抢修干部联席会议的发言摘要,1951年9月27日,未刊。

《金日成略传》,平壤:外国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山西省档案馆,C54-1005-17,第16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

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援朝铁路经费预决算执行情况报告》,1954年4月19日,未刊。原文是按旧币计算的,195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1元相当于旧币1万元),这里已折算为新币,下同。

截止1952年5月,中国民众共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飞机价值的钱款,中华救济总会还送去了大批粮食和生活用品。

安置和救济朝鲜难民,是中国政府帮助朝鲜的一个重要内容。战争期间朝鲜疏散到中国的难民共约13000余人(其中11000人在延边)。北方各地政府都为此做出了专门通知、规定,如河北省把救济朝鲜难民与慰问志愿军结合起来,发起募捐运动,热河省先是发起以县城为主的捐献运动,随后又普及到每个村庄、工厂、学校和街道,要求每星期汇报一次捐献情况。山西省则在《山西日报》发布了十条规定,把发动募集救济朝鲜难民运动作为中苏友协的中心工作,要求会员带头捐献。东北地区,特别是延边各县,更加责无旁贷。根据吉林省《凡自由移来之难民均由招待站移交当地政府安置》、《友方人员移来我省必须适当安置及处理》的指示精神,1950年11月,延边地委召集各县市长、公安局长会议,由书记朱德海亲自挂帅,在稽查处、开山屯、图们、南坪、凉水泉子、圈河等多处设置难民接待站和联络处,专门负责接待和安置工作。救济经费除专员公署承担外,还动员各地民众捐助,有钱出钱,有房出房,有衣出衣,有粮出粮。三年战争期间,延边地区共安置朝鲜难民11728人,提供救济款项14.88亿元(东北币),衣物43180件,以及难民归国费用10.1亿元。此外,延边各县还设有伤员接待站和后方医院,仅1950年下半年就收留、医治朝鲜伤病员5万多人。

战争初期,朝鲜有大量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的安置和抚养也是令朝鲜政府头疼的事情。为此,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均施以援手。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到1952年下半年,各国接收朝鲜孤儿给予教育的情况如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蒙古各200名,罗马尼亚1500名。中国东北政府主动向朝鲜政府提出建议,战争结束前,可以派遣学龄儿童来中国接受教育。到1952年第三季度,中国政府共接收朝鲜儿童23000名。东北政府还在1952年10月12日专门提出了一个接收和安置朝鲜难童的方案,其中要求,根据安东和图们口岸接收难童的实际情况设立接待站,安东省、辽东省和图们市组织民政、卫生、财政、公安等各部门干部负责具体工作,东北民政局和吉林省民政局派人协助。对于这些难童的接待、检疫、安置、医疗、饮食及教育问题,均做出了详细规定,还为他们专门建立了初等学校和幼儿园。

中国政府为朝鲜政府和人民提供的帮助还有很多方面,如接纳大量工人、海员和大学生来中国实习或学习,免费运送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家援助朝鲜的过境物资等等。

尽管中朝之间在战争的战略及策略方面有很大分歧,甚至矛盾,但是从大量的史料看,毛泽东一直特别强调要加强双方的团结和友谊,尤其是涉及人民生活方面,中国政府几乎是竭尽所能,有求必应。战争结束后,仍然继续了这种方针。

二、中国对朝鲜战后重建的援助

朝鲜停战以后,尽管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参战各方未能就结束战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也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1952年10月27日,周恩来致函金日成告知,为帮助朝鲜人民过冬,特派商业部副部长长沙千里专调50万套棉服、150万双胶鞋赠送朝鲜。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208-03,第47-49页。

河北省档案馆,694-7-10,第103-105页。

河北省档案馆,855-1-73,第1页;699-1-6,第3页;山西省档案馆,C49-4-55,第1页;C42-1-107,第1页。

金英玉《无私的援助,神圣的责任》,《延边文史资料》第10辑(2003年),第212-219页。

费德林给马立克的报告,1953年1月29日,普希金给马立克的报告,1953年2月23日,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研究所编:《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六·二五战争报告书》第三编(俄文档案影印本),2001年6月,第12、13、14页。苏联对此似乎比较计较,直到上述报告递交时,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联合会与部长会议、外交部之间还在为是否接收100名朝鲜孤儿打笔墨官司。

河北省档案馆,700-3-775,第10-15页。

详细资料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031、106-00031、106-00036、106-00036-11和109-00161、109-00330、109-00360各卷宗。

如1952年8月22日洪学智来电,说朝鲜政府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解决过冬棉衣问题,至少30万套。毛泽东第二天就在来电上批示:“30万套冬服,可作赠送。”28日又在外交部答复朝方的电报稿上加写:“此30万套棉衣作为赠送,不要付款,也不要记帐。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没有人想要在东北亚重新挑起武装冲突了。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朝鲜面临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三年多的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严重。据1954年3月苏联使馆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资料撰写的详细报告,在战争期间,朝鲜人口锐减近120万(此外还有60万人被征兵),造成劳动力严重匮乏。直接经济损失达4200亿朝元(约合140亿卢布),有近9000座工业建筑、60万所住宅、5000所学校、1000家医院、263座剧院和电影院以及数千其他文化生活机关变成废墟。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品产量急剧减少:电力生产从1949年的59.24亿度下降到1953年的10.16亿度;采煤量从394.3万吨减少到68.8万吨;钢从14.4万吨减少到0.35万吨;水泥从53.7万吨下降到2.65万吨;食盐从28万吨下降到4.2万吨,有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冶金、化学、燃料遭到彻底破坏。交通业损失615.86亿朝元,424个火车头及11118节车厢被完全炸毁,14个港口和港湾及1600座服务性建筑遭到轰炸。国家商业网点全部遭到破坏,1237个商场无一幸存。农业损失也很严重,除大量农作物被毁外,被宰杀和被掠走的牛羊10.9万头,猪13.5万头,毁坏果树8.9万棵。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没有外来援助,朝鲜的经济重建是难以想象的。

早在战争期间,金日成就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心急如焚。1952年因铁路管理权和停战谈判问题,朝鲜与中国发生严重矛盾和争执,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此。所以,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寻求经济援助的对象,不是与其长期并肩作战的

中国,而是一直处于幕后的苏联。

停战协议签字三天后,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便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一份关于战争造成损失情况的详细报告及政府的正式照会。照会请求苏联派遣62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并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照会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8月3日大使馆向莫斯科转呈了照会全文,并表示:“以肯定的态度研究朝鲜政府的请求是适宜的。”就在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一项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援助,用于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恢复。二天以后,即8月5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1956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1961年),建立工业化的基础。金日成在会上激动地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给我们10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做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

然而,金日成有些过于乐观了,莫斯科的热情并没有朝鲜人期望和宣传的那么高。早在停战协定签字前(7月1日),副外长葛罗米柯就叮嘱驻朝使馆,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申请前,不要与他们讨论派遣专家的问题,在朝苏联顾问也不要向朝鲜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341-1344页。另参见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朴昌玉关于朝鲜人民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4月24日,第3版。

尽管对外援助的定义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狭义的援助只是赠与(或曰无偿援助),而广义的援助还包括贷款、贸易等形式。参见詹姆斯·卡特:《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陈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20页。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327、1328页;АВВРФ,ф.0102,о.п.09,п.44,д.4,转引自Charles K. 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Cold War History,Vol. 5, No. 2, May 2005, p.163.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326页。

《金日成著作集》第8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5页。实际上,此时关于援助朝鲜10亿卢布的决定,苏联尚未形成政府文件,也没有正式通知平壤。

有学者考察,苏联第一次表示愿意提供对外经济援助是在194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但会后并没有具体行动和计划。1951年苏联再次表示愿意向远东经济委员会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扩大贸易,但仍没有具体行动。1953年4月,苏联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技术援助协定,这是苏联同不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定。詹姆斯·卡特:《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第8、9页。

政府提任何建议。苏联政府还要求在朝专家向朝鲜人建议,“在确定工业恢复计划时,要以朝鲜国民经济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复的内部潜力作为出发点”。但8月7日苏联使馆报告根据情报,朝鲜政府的打算是请求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对其遭到破坏的工业企业恢复提供全面援助,而苏联要承担的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大型企业”。具体办法是苏方提供工程技术人员、设备和材料,朝方则负责当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从朝鲜的现有计划看,其“主要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潜力,而是指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最大援助”。使馆建议,关于援助朝鲜的问题,邀请金日成赴莫斯科当面商议比较适宜。显然,苏朝之间对援助问题的考虑是有差距的。

8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做出决议,责成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外贸部长米高扬研究对朝鲜的援助问题。根据这个决议,莫洛托夫指示驻朝大使苏兹达列夫正式通知金日成,苏联已决定给予朝鲜10亿卢布的援助,并要求朝鲜政府就如何具体使用这笔援助款项提出意见。就在同一天,金日成向苏联驻朝首席军事顾问鲍里先科提出,希望8月25日去莫斯科访问(正式或非正式均可),就经济恢复等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会谈。8月12日,金日成再次向苏联大使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8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于9月初访苏。

经过协商,苏朝政府于9月19日签订了援助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10亿

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6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扩建,如金策制铁所、城津炼钢厂、南浦冶炼厂、水丰发电厂、兴南肥料厂、平壤纺织厂和一部分电气铁路等;4亿用于新建项目,如平壤丝织厂、沙里院拖拉机修理厂、平壤红十字中央医院、中央广播电台等。苏方负责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设备供应和安装及培训朝方技术干部。此外,对于此前苏联给予朝鲜的2.98亿卢布贷款推迟了归还期,即从1957年起10年内以商品偿付,利息也从原来的2%降为1%。朝鲜在战争期间所欠非贸易付款债务约0.73亿卢布被免除50%,其余部分从1957年起两年内归还。对于专项贷款也推迟了还款日期,缩减了还款数额。看来,苏联人是经过精细算计的,而这个援助力度显然未能满足朝鲜的要求。回到平壤后,金日成一方面派商业相李周渊赴东欧各国求援,一方面准备亲自前往中国。

其实,还在战争后期朝鲜就开始寻求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并小有收获。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又争取到一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卢布),但使用期限为10年。实际上,到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即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正如一位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329、1330页。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3年8月10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莫洛托夫致苏兹达列夫电,1953年8月11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11-12。

鲍里先科致索科洛夫斯基电,1953年8月11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8-29。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8月17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3年8月19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5。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1953年12月31日,АВПРФ,ф.0102,оп.7,д.47,п.27,л.115-120;费德林致维诺格拉多夫函,1956年9月29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307-327;《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第6版。苏联的10亿卢布分两次拨付,1954年6.5亿,1955年3.5亿。见АВПРФ,ф.0102,оп.11,п.61,д.12,л.4,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3 2009, с.122。所谓专项贷款,可能指军事贷款。

如果知道苏联对外援助的整个情况,金日成应该感到满足了。苏联第一次正式向新中国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不过12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不是无偿援助),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笔援助只是1954年支付给阿富汗的700万美元,合2700万卢布。见《苏联对外贸易基本统计(1954-1975)》,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5页。

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二,1956年4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70-172;《人民日报》1954年1月24日,第6版;《人民日报》1956年7月9日,第5版。另参见Bernd Schafer,“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GDR and North Korea, 1949-1989”, CWIHP Bulletin, Winter 2003-Spring 2004, Issues 14/15 p.25; Armstrong, “Fraternal Socialism”, pp.168-169, 174-175。

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 ,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况且,朝鲜在经济利益方面从来就是斤斤计较的。新中国建立前夕,中朝在商谈鸭绿江电站的电力分配时,中国希望得到总发电量40万千瓦的50%,而朝鲜只答应输送2万千瓦,尽管在该电站建设时中国的投资大于朝鲜。抗美援朝作战初期,金日成在一些问题上锱铢必较的做法也令中国人多少有些气恼。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自带干粮,但因缺少柴草无法做饭。关于这个问题,在志愿军入朝前金日成就派人来通知,志愿军所需柴草可以按市价由朝鲜方面提供,若没有现钱,亦可战后结算。如今要向中国伸手求援,朝鲜人多少应有些尴尬。

然而,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和东欧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还表示,可以签署一个秘密的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亿元。这些款项以物资援助的方式提供给朝鲜:335万吨煤、28万吨焦炭、3.39万吨棉花、0.3吨棉线、8.72万米棉织品、41万吨玉米、0.4万吨大米、17万吨大豆、1.12万吨橡胶、1.25吨纸、5.29万吨钢制品、0.55万吨铁轨、1600节客运及货运车厢、1500个机动车轮胎、

4000辆手推车,以及2万吨各种型号的金属钢管,共3000多个品种。另据东德档案记载,1953年中国还签订了另一项援助朝鲜1500万元(合2760万卢布)的协议。这批补充援助的66.3%以物资的形式兑现,如煤、棉花、运输材料、化工原材料、医药以及日常消费品等,其余33.7%则以项目投资的形式兑现,如恢复和修建铁路、运输及培训专家等。

此外,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将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承担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费用。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的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上述费用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以及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旅差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甚至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都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

Bala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CWIHP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pp.87-90.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6日,А П Р Ф, ф.3, о п.65, д.363, л.20-23.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10日,未刊,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2000年9月12日,北京。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34、335页。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1953年12月31日,А В П Р Ф, ф.0102, о п.7, д.47, п.27, л.115-120;《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4日第1版。1955年3月中国发行新货币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1人民币相当于2卢布0.3821美元。见对外贸易部编印《对外贸易有关资料汇编(第一分册)我国对外贸易基本情况》,1956年5月,第45页,未刊。另据中国有关资料,战争期间中国对朝鲜贸易顺差8053万美元,1953年都无偿赠送给朝鲜。见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但这笔款项是否已算入对朝援助的7.29亿元(约合2.785亿美元),不得而知。

关于兄弟国家的经济援助(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的报告),1956年9月8日,PA MfAA(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A7013, Bl.17.

关于兄弟国家援助朝鲜国民经济重建的综合材料,1956年1月4日,PA MfAA, A7013, Bl.50.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1953年12月31日,А В П Р Ф, ф.0102, о п.7, д.47, п.27, л.115-120。关于朝鲜实习人员和专家条件的协定书,见上海市档案馆, A38-2-352, 第50-52页。

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另有所图”。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领导人,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中朝协议签订以后,1953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一个宣传指示,其要点是:此次协定的签署,是抗美援朝战争后的“又一次重大事件”,“符合中朝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那种认为只是单方面援助朝鲜的看法是错误的,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也帮助了中国,过去对朝鲜人民帮助我们的宣传少了一些,今后应当注意;朝鲜在这次战争中损失很大,生活十分艰难,这次援助是非常必要的;朝鲜的恢复和强大,有利于中国,朝鲜民族的优点

如不怕艰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过去宣传不够,今后应当增多。用周恩来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时的说法,就是“把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止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削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到上海的实习生共269人,基本上都分配在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企业,其中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39人,私人企业222人。到沈阳的509人,多数是由中国抚养的朝鲜孤儿。他们被分派到31个工厂,学习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生产技术,准备一年后回国参加建设。

关于苏联对朝鲜的援助,阿果夫博士计算的结果是18亿卢布,除了延期归还的贷款2.98亿和免除的非贸易付款债务0.75亿卢布外,还加上了1.4亿卢布贷款和5亿卢布的军事援助。见Avram Agov,“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1945-1970”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2010, Unpublished, p.255, 256.

两年以后,苏联对中国提供援助金额折算卢布的计算方法有变。根据苏联外贸部的资料,中国提供给朝鲜的商品价格远远高于苏联商品的出口价格,如此计算,中国援助朝鲜的8亿元人民币只约合8.5亿卢布(РГАНИ, ф.5, о.п.28, л.314, л.45-48)。此后苏联对援助金额的统计,均按照这种方法。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1955年3月以前为1卢布等于人民币5000元,中国发行新币后,应为1卢布等于0.5元。后来苏联提高了卢布汇率,1958年中朝两国贸易改以卢布为计算单位时,经国务院批准,1卢布暂照0.95元人民币计算。见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通知,1958年2月4日,湖北省档案馆, SZ73-02-0351-007。

1956年苏联减免对朝的5.6亿卢布贷款,1960年减免了7.6亿卢布贷款,后来朝鲜又赖掉了对苏联的欠债1.4亿卢布(Agov, “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p.208)。这14.6亿卢布自然可以视为苏联对朝鲜的无偿援助。

1953年中国的国家预算收入233.5亿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照此计算,中国向朝鲜提供的无偿援助已占当年整个国家预算收入的3.4%。

Kim Deok, “Sino-Soviet Dispute and North Korea”, Korea Observer, 1979, Vol.10, №1, p.12.

山西省档案馆, C54-1005-15, 第85-89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35页。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4月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л.314, л.45-48。另有统计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占1954年朝鲜财政收入的35%。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一,1956年4月1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л.412, л.164-167。

上海市档案馆, A38-2-352, 第1-4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26页。

《人民日报》1956年8月25日,第2版。

1954年中国还派遣了295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前往朝鲜参与经济重建工作。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米,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仅1957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43万个劳动日。到1958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修复和新建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1954年3月11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

三、北朝鲜三年经济计划的完成

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对朝鲜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4年4月2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做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1956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2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将超过战前水平19%。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30%以上。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1954-195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9.22亿元,进口总额1.27亿元,差额7.85亿元,主要以外援资金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万吨,大豆17.8万吨,棉纱3950吨,棉花35590吨,棉布8847.6万米,煤炭345.6万吨,焦炭26万吨,橡胶1.12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苹果等。为了保证对朝鲜的出口任务,中国对外贸易部要求,对朝鲜(和越南)的援助,必须在中央批准的计划下,尽力设法满足其要求;同时还应帮助他们审查需要情况,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可能的物资力量。对朝鲜(和越南)的一般贸易,应在推动其有计划的发展生产的原则下,尽量予以照顾。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朝鲜战后恢复和重建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重建的工业项目80%以上是在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而完全是由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独自负责建设的工业项目共90个(不含军事项目),占此期间朝鲜恢复和新建工厂总数的20%。

朝鲜的三年计划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

关于兄弟国家援助朝鲜国民经济重建的综合材料,1956年1月4日,PA MfAA A7013 BI.51.

《人民日报》1954年3月31日,第1版、6月25日,第3版、5月9日,第1版、5月28日,第1版、6月6日,第1版。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5日,第5版、1958年10月31日,第3版。关于志愿军对朝鲜的帮助,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511-518页。

《人民日报》1954年3月23日,第4版。

《人民日报》1954年4月24日,第3版、4月27日,第4版。

详见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1946-1978)》,韩国国土统一院调查研究室,1979年2月,第10页,未刊。

李富春关于中朝贸易谈判的请示,1957年9月30日,中国国家计委档案科,未刊。

对外贸易部1954年对外贸易工作基本总结与1955年工作安排,1955年6月25日,对外贸易部办公厅编印:《对外贸易部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5)》,1957年3月,第28页,未刊。据俄国档案的资料,到1956年,中朝贸易极不平衡,中国供货量按价值超过朝鲜供货量几乎11倍。1956年的9个月中,中国向朝鲜出口完成全年计划的90%以上,而朝鲜在同期只完成58.4%。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ABИPΦ,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63。

Armstrong, "Fraternal Socialism" p.164.

Agov, "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pp.256-257.

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106%，并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290个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外来援助也在客观上鼓励了朝鲜领导人急躁冒进的情绪。朝鲜的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了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朝鲜政府在恢复时期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1954年871亿朝元，1955年979亿朝元，预算支出总额，1954年806亿朝元，1955年999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年439亿朝元（占54%），1955年608亿朝元（占61%）。1955年出现财政赤字20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108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193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为304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35%），1955年为234亿朝元，减少了70亿朝元。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1955年1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但

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37%，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4个月（1954年9-12月）间从998个（1.87万农户）猛增到10098个（33.27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万吨，而计划是300万吨。不满的农民干脆屠宰牲畜，吃掉种子，然后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1公顷）30-35公担，但实际上不到20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愈演愈烈。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很多基层干部也因征粮、收税没有完成任务而受到

《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第4版，3月26日，第3版。

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一，1956年4月16日，РГАНИ，ф.5，о п.28，д.412，л.164-167。

库兹涅佐夫夫人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1955年1月，РГАНИ，ф.5，о п.30，д.120，л.28-46。

《金日成著作集》第9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第4版。

彼得罗夫与宋晋发谈话纪要，1955年4月6日，РГАНИ，ф.5，о п.28，д.314，л.200-207；彼得罗夫与朴·德米特里耶维奇谈话纪要，1955年3月31日，РГАНИ，ф.5，о п.28，д.314，л.187-193；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55年4月13日，MOL XIX-J-1-j Korea 7.doboz 5/f_006054/1955，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 p.107。

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三，1956年4月17日，РГАНИ，ф.5，о п.28，д.412，л.174-176；库兹涅佐夫向苏斯洛夫提交的材料，1955年1月13日，РГАНИ，ф.5，о п.30，д.120，л.43-46；彼得罗夫与宋晋发谈话纪要，1955年4月6日，РГАНИ，ф.5，о п.28，д.314，л.200-207。

彼得罗夫与朴·德米特里耶维奇谈话纪要，1955年3月31日，РГАНИ，ф.5，о п.28，д.314，л.187-193；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55年5月10日，MOL XIX-J-1-j Korea 5.doboz 5/c_006048/1955，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 pp.107-108。另参见 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с.126。

处罚,1954年平安北道很多干部因收缴粮食税未完成任务被开除党籍,有130人自杀。

其四,一味追求国有化,急于消灭私人贸易和家庭手工业。朝鲜私营企业1949年占工业企业的15%,到1954年就缩减到2.5%以下,1955年的计划是降到1.3%。私营资本在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49年的46.8%降到了1954年的22.8%以下,还有近90%的私人餐馆关门,致使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居民失去了谋生手段。如此做法,进一步加重了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困境。

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决了燃眉之急。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

另一方面,在整个经济重建的过程中,针对金

日成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劳动党内的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则往往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党的经济政策,这自然引起金日成的不满,党内高层矛盾由此激化。

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其特点之一就是宗主国并不要剥夺藩属国的主权,要求的只是臣服和追随。毛泽东熟读古书,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亚洲革命的负责人,在他的头脑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理念。对此,陈兼教授有一个说法非常到位:“毛泽东认为派兵入朝不是为了实现‘低级的目标’——控制朝鲜的政治和军事,而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目的,使朝鲜在内心接受中国指导亚洲革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后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不惜血本援助朝鲜,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对朝鲜的方针从来就不是以力服人,而是施以恩德,以此换取对方心悦诚服,感恩戴德。可以认为,新中国政府对朝鲜的外交方针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当朝鲜党内矛盾激化而引起对金日成原延安派干部的严重打击,乃至毛泽东认为朝鲜试图摆脱社会主义阵营时,这一方针便开始发生变化。

库尔久科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1956年6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238-241.

波诺马廖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函,1955年5月17日;库尔久科夫对苏联驻朝使馆1955年政治报告的简介,1956年3月31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212-214,271-279.

库尔久科夫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1955年4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6-20。另参见Balazs,“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p.90.

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4月1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36-151。另参见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с.127.

Chen Jian,“Reorienting the Cold War: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arly Cold War Experience,Taking Korea as a Central Test Case”,Tsuyoshi Hasegawa(ed.),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1945-1991),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88.